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上海,来到巨鹿路675号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老洋房。看着这里的爱神花园、旋转楼梯和历任作协主席的相框,触景生情。这是一座有故事的房子,曾经进进出出、来来往往的文学先辈,是一个个生动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活泼地来过,又飘然地离去,回想这一切的流逝,感念万千。

我祖父与巨鹿路675号的渊源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1949年5月,穿惯了西装和长衫的他,换上了戎装,作为军管会的重要成员,迎接上海解放,负责接管文化工作。作家、戏剧家和电影家等的多重身份,使他在上海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全面布局,在力保上海文化赓续传承的同时,也顺利地跟上并引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步伐。时过境迁,七十多年后,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对上海文化的深刻影响,他当年的深耕细作仍然体现在文化发展的诸多细节中。

我祖父的朋友圈里,上海的老友是最重要的一个群体,他们之间有着永不失联的深情厚谊。譬如他与巴老的感情是众所周知的,巴金先生两赴朝鲜完成的中篇小说《团圆》,是经我祖父的提议,由长



我在新加坡生小宝的时候,是剖腹产。在此之前,从未动过任何手术的我,一直以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但在新加坡做手术,被告知是本人签字。我有点不解,医生说,在新加坡任何手术都是本人签字,除非失智、失能,无法做主。她意味深长地说:“生死大事,当然应该由自己掌控。”

我觉得合情合理,把医院给我的十几页文件一页一页仔仔细细看过,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没想到,不久之后,我就把从这件事学到的经验,用在了我爸爸身上。

我爸爸患有帕金森综合征,还有糖尿病。老人家很喜欢读书看报,他通过这个途径,了解到帕金森综合征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缓解病情,提高生活质量。具体做法是在脑部植入一个微型脑起搏器,在胸部植入该起搏器的充电器。他当时受帕金森病的影响,生活起居开始出现很多问题。

但凡手术,必有一定风险,且糖尿病人的凝血功能较差,风险更大。我妈妈觉得当时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伴,做这种手术有很大风险,不由分说拼命反对,几乎做到了油盐不进、谁劝都不听的程度;我弟既想让我爸做手术提高生活质量,也担心手术失败,被老妈怪罪,自己也过不去那个坎,始终不肯明确表态,于是压力给到了回国探亲的我。

我爸和我谈了很久,表达了很强烈的做手术的意愿,也给了很多医疗资料让我了解。我花了两天的时间,仔细阅读了所有的资料,觉得这个手术非常先进,的确能大大改善病患的生活质量,但也很担心风险,如果手术失败,我恐怕无法面对我老妈,更无法面对自己。

于是我建议老爸,如果决定了做这个手术,一定要自己签字,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说服我妈妈同意。老爸虽然患有帕金森病,但神志非常清楚,一向也是个很理性的人。他足足考虑了两个星期,最后依然决定做手术,并且在手术之前,他很坚定地向我医生表明他要自己签字,不会让老伴或子女签字。

所幸老爸手术很顺利,之后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我们全家都很高兴。

生死大事,的确应该由患者本人签字决定。而患者本人一旦签字,就应该承担一切后果,不能事后再来怪罪旁人,甚至迁怒于医生,闹出很多医患纠纷。

夏衍和巨鹿路675号

沈芸

春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的,我祖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这部电影就是1965年元旦上映、轰动一时的《英雄儿女》,著名的《英雄赞歌》正是这部影片的插曲。1962年,我祖父为香港凤凰影业公司改编了巴金的小说《憩园》,是为主演夏梦量身定制的,夏梦很喜爱巴金的作品,所以我祖父也认为由夏梦出演万昭华这个角色是非常合适的。影片完成是在1964年,特殊的年份,影片没有公映,我祖父没有上名,也没有观看。等到1981年,香港电影学者林年同先生,将已改名为《故园春梦》的剧本复印件交给我祖父时,他感慨地说:“正像找到了一个被我遗弃了多年的孤儿。”

巴老身边的工作人员陆正伟先生曾在《四见夏公》这篇文章中记述了1987年10月的一天,我祖父来到巨鹿路675号的情景:“听说首任主席夏公要来作协老友的消息后,我既兴奋又紧张,……午后,我早早等候在东厅门口了。没想到,夏公与我一样也是个‘急性子’,他比约定时间提前了半小时到作协,然后拄着手杖缓步朝东厅走,在沙发前把手杖往边上一靠,独自坐下来,习惯地双手交叉作抱猫状,抽着烟。我见他熟门熟路的模样,想起他当年的秘书李子云的话

——她说,夏公兼华东作协主席时,在东厅摆了个‘测字摊’,每星期固定一个晚上接待来访人员,征求对文艺界的意见和建议,广受大家好评。那天,夏公和我说了些什么,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自语道:‘没变,还是老样子。’没过多久,老作家师陀、吴强、柯灵、于伶、王西彦、茹志鹖、辛笛、陈伯吹先后走进东厅。夏公与他们一一握手,口中报着名字。寒暄过后,大家围坐一起拉家常似的谈文学、叙旧情、忆故友。”

这段回忆中,有几个关键的细节,“提前了半个小时”“熟门熟路的模样”,还有被多次提及的“东厅”,“他自语道:‘没变,还是老样子。’”我祖父在上海几十年的经历,留下许许多多痕迹,巨鹿路675号无疑是重要的一笔,我想,这是他会选择故地重访的地方,在这里与老友们叙旧。

因此,我要特别感谢上海作协党组,感谢本次会议的筹备团队,是你们的热情和努力,使这次纪念会得以在我祖父工作过的地方圆满召开,让我们回到历史的现场,感受历史的温度,一起来怀念我的祖父。

今年,是“左联”成立95周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是《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同时也是我祖父诞辰125周年和逝世30周年。我祖父的一生与二十世纪各个重大历史时间节点交

那一瞬间

刘毅雪

那天午后,我在校园里漫步。走到菜园边,一个奔跑的同学撞了我一下。身体猛地一倾,眼看就要栽进菜园。就在那一瞬间,一只温热的大手稳稳抓住了我的右胳膊。站稳后我才看清,是听障班的马越同学。我连忙道谢,可他却没松手。这时周围渐渐围拢了些同学,细碎的议论声里夹杂着起哄,我一时抹不开面子,挣开了他的手。

那一天我总有些魂不守舍。反复想着,那样干脆地甩开他的手,是不是太不礼貌?明明他在关心我,我为什么要因为那点莫名的面子,辜负了这份善意?原来一瞬间发生的事,远比我们察觉的要多。马越掌心的温度,还有我隐秘的愧疚,都刻在了那个瞬间里。

编者按:这是来自异乡的笔,为上海写下的一组文学肖像。我们邀请近年参与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写作计划”的外国作家,写一写他们的上海印象。

去年九月,我应上海市作家协会的邀请,重返上海参加上海写作计划。在抵达上海的第一个夜晚,我穿上鞋,独自漫步在街头。我曾去过中国的几个大城市旅行:北京、成都、深圳等。但没有哪个地方的夜晚像上海那样热闹,也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一样,能随处遇见外国人。而如今,物是人非。这些纷乱的思绪,促使我一直走着,漫无目的,直到我停在一家熟悉的电影院前。

2019年某个夏日,我在手机软件上看到通知,说将举行为期三天的埃里克·侯麦电影专题放映。我想起了前一个冬天在一家小酒吧认识的一个男人。得知他是拍电影的,我曾问他一个电影专业词汇——“long take”(长镜头)用中文怎么说,因为我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陈英雄,一个喜欢使用长镜头的导演。从陈英雄,我们聊到了法国新浪潮,那是长镜头成为主导风格的时代。看到侯麦的电影专题,我便发消息问他会不会来看。他回复说,已经离开上海去了深圳。于是我和两个对“新浪潮”一无所知的女孩去看电影。她们来自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

我坐在小小的饭桌前,电饭煲正在煮着饭。窗外是普罗旺斯明澄的夕阳,一排排矮小的红色平房站立在远方。依然在暑假期间的大学生校园静谧空旷,只有盘旋在空中的海鸥不时发出嗷嗷鸣叫。风景、声音、空气,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

电饭煲“嘟嘟嘟”地叫着。我拔掉插头,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塑料饭盒。饭盒里一个保鲜袋,袋子上清清爽爽没有丝毫油腻,被仔细地打了结。我解开袋子,一股油香气散发出来。一块块胸背厚实、皮肉金黄的干煎带鱼露出脸孔来。

“你明天晚上自己烧点饭,把带鱼吃掉……”妈妈站在厨房里一边煎带鱼,一边夹杂着脱排油烟机的声音,对我喊着。

二十多个小时后,我站在世界另一头的学生宿舍里,狼吞虎咽地吞着白饭配干煎带鱼。鱼肉的肥软鲜甜和浸润其中的油香气的慷慨,让我眼眶发热。

那是二十年前,二十岁出头的我,一个人拖着四十公斤行李,连滚带爬地来到世界另一头吃上的第一顿饭。

从巴黎机场把爸爸妈妈接回家里。妈妈弓着腰,从行李箱里拿出一个大塑料盒、一个塑料袋。

“昨天出来前给你煎了点带鱼,还带了两只酱鸽,今天晚上你不用烧菜了。”她像塞宝贝一样地把塑料

织在一起。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从东京回到上海,5月底在北四川路海宁路的一家烟纸店楼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2日,“左联”在虹口成立,大会推定鲁迅、钱杏邨、沈端先(即夏衍)为主席团成员,而后他又被大会选为包括鲁迅在内的七人执行委员;1933年,以我祖父

那天午后,我在校园里漫步。走到菜园边,一个奔跑的同学撞了我一下。身体猛地一倾,眼看就要栽进菜园。就在那一瞬间,一只温热的大手稳稳抓住了我的右胳膊。站稳后我才看清,是听障班的马越同学。我连忙道谢,可他却没松手。这时周围渐渐围拢了些同学,细碎的议论声里夹杂着起哄,我一时抹不开面子,挣开了他的手。

编者按:这是来自异乡的笔,为上海写下的一组文学肖像。我们邀请近年参与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写作计划”的外国作家,写一写他们的上海印象。

去年九月,我应上海市作家协会的邀请,重返上海参加上海写作计划。在抵达上海的第一个夜晚,我穿上鞋,独自漫步在街头。我曾去过中国的几个大城市旅行:北京、成都、深圳等。但没有哪个地方的夜晚像上海那样热闹,也没有哪个地方像这里一样,能随处遇见外国人。而如今,物是人非。这些纷乱的思绪,促使我一直走着,漫无目的,直到我停在一家熟悉的电影院前。

2019年某个夏日,我在手机软件上看到通知,说将举行为期三天的埃里克·侯麦电影专题放映。我想起了前一个冬天在一家小酒吧认识的一个男人。得知他是拍电影的,我曾问他一个电影专业词汇——“long take”(长镜头)用中文怎么说,因为我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陈英雄,一个喜欢使用长镜头的导演。从陈英雄,我们聊到了法国新浪潮,那是长镜头成为主导风格的时代。看到侯麦的电影专题,我便发消息问他会不会来看。他回复说,已经离开上海去了深圳。于是我和两个对“新浪潮”一无所知的女孩去看电影。她们来自复旦

袋递给我,“我给你剥了一斤毛豆,时鲜菜,你这里吃不到的。”妈妈的脸上满是兴奋愉快。旅途的劳顿、时差好像对她全无影响。飘散在额头前的白头发映衬着晶亮的黑眼珠,显出孩童般的简单和热情。好像她飞十几个小时,就是为了把干的

带鱼、毛豆和淡菜

梅思繁

煎带鱼、酱鸽和毛豆送到我手里一样。

“你这里咸菜有的吧?你毛豆咸菜炒炒,或者烧在汤里也可以。”

晚上爸爸妈妈回到他们的住处。我站在厨房里烧着毛豆番茄汤的时候,看着一粒粒光洁饱满的豆子,想象着妈妈在上海家里厨房剥毛豆的情景。夏天厨房里的蒸笼热,她一边剥豆子一边把手机放在桌

子上看旅游视频,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因为腰疼皱眉头……滚烫的毛豆番茄汤在餐桌上冒着热气,我舀了一勺散落着豆子的热汤轻吮进嘴里。豆子的软糯和番茄的清甜混合在一起,我喉咙发紧。

“晚上到我这里来吃饭,我买了两只鹌鹑!”“星期天中午来吃饭,新鲜的马鲛鱼清蒸。”“今天买了活虾和蛏子,让小西下班了直接过来。”

每次来巴黎小住,“来吃饭”,这是妈妈说得最多的三个字。市里

为组长的中共“电影小组”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开始参与并逐步掌握中国电影的领导权;1935年,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公映,《义勇军进行曲》诞生,日后成为国歌,我祖父是这一伟大事件中的创作者、组织者、参与者和亲历者;1937年,他在上海,与郭沫若先生创办了国共合作的《救亡日报》,抗战胜利后,作为在文化抗战中战斗在一线最骁勇善战的一员,我祖父从重庆回到了上海,那一年他45岁。

当年从日本归国的沈乃熙,成了左翼文化运动的沈端先,而上海大革命的风暴,又使沈端先淬炼成为夏衍。他在上海完成了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三部作品:《包身工》《赛金花》《上海屋檐下》。我一直认为,上海之于夏衍,如同绍兴之于鲁迅,北平之于老舍。今天,我们在这里探讨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及多重价值,仍然意义非凡。对于如烟往事的解释,有两种,一种是渐行渐远,一

文字研究中心,专攻古文字研究。

2019年冬天,那个男人从深圳回到上海,带我去看一部关于作曲家坂本龙一的纪录片。那部纪录片是由现场拍摄与人物访谈、珍贵旧影像交织而成。影片的大部分内容记录了坂本龙一在治愈癌症后的康复阶段。放映那天,红毯铺展开来,检票员穿着黑色西装,戴着白手套,让我有种去听大型

我的上海电影记忆

(越南)阮刻银微

音乐会的错觉。来看纪录片的人并不多,但那一刻的艺术氛围,却让我一直感动不已。

无论是观看埃里克·侯麦的电影,还是那部纪录片,对所有热爱电影的人而言——不管是观众,还是艺术家,都是一次极为美好的体验。这两次观影的地点,都是在大光明电影院。这家影院由一位中国商人与华纳兄弟娱乐公司创始人合作建于1928年,被誉为“远东第一影院”。即便当时还不了解大光明电影院的来历——例如它由一位匈牙利建筑师设计,以当时风靡全球的装饰风艺术重现——我依然能感受到,这家影院就像这座城市的

的露天菜场一周开三天,她一次不落。这家买便宜的蘑菇青椒,那家找新鲜平价的西红柿。我平时不舍得买的活虾鹌鹑她买,我平时没耐心处理的蛏子蛤蜊她也买。看我和先生津津有味地吃着葱油蛏子蛤蜊炖蛋,她一脸满足开心。

离别前一个星期,妈妈会开始有些小伤感。

“下次再烧饭给你吃,又要过大半年了……”

“现在帮不了你什么,也就是给你烧烧饭……”

“走之前再买次活虾,买点好的海鲜烧给你吃……”

要离开巴黎前一天的晚上,她从冰箱里拿出一个塑料盒给我。一盒铺得整整齐齐的淡菜肉。

“我昨天在菜场买的。弄干净给你烫好好了,你分批冷冻起来,煎蛋,做意大利面,烧汤都好吃的。忙的时候没菜,随时拿出来就能用……”

爸爸妈妈坐着飞机,向着千山万水之外的上海飞去了。我站在厨房里,想起消失在海关窗口处妈妈的身影。那小小的急匆匆的背影,那坚定有力的脚步。电饭锅里上扬的蒸汽令我双眼模糊。

柔软肥硕橘黄色肉身的淡菜,被金黄的鸡蛋夹裹着,安静地躺在盘子里。它们是九千公里外,我的妈妈向我传递的感情。她在跟我说,虽然我不在你身边了,虽然你已经变成一个大人了,可我还是在用我的方式尽我所能地守护你。



碧脉芳踪 (纸本水粉)

刘思含

种是历久弥新,我更愿意相信后者。

(作者为夏衍孙女,本文为作者在纪念夏衍先生诞辰125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同的艺术流派。我始终以这样的精神记住上海。对我而言,大光明电影院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在上海的那些年里,我既能把这座城市视作一处陌生而值得探索的世界,也能当作包容自己的家。

那些关于大光明电影院的记忆,让我想起《万世虚无》中的一句话:“人们通过过往的经历来感知时间,而这些经历总是与特定的对象紧密相连。人们以为拥有了这些经历也就拥有了彼此,抓住了时间的流转。这总是一个无尽的循环。”2019年以后,那位旧友再也没有机会重逢。冬天相遇,夏天错过。唯有那些电影院,始终伫立在那里,像是为了见证也为了记录人们一次又一次的擦肩而过。我深信,那家近百年的老影院,必然见证过比一段人生更多的起伏与变迁。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而城市的心脏,依然在跳动。我心里一闪而过:外国人终会再次回到上海,像以往一样,不仅出现在电影银幕上,也出现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去体会那股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

十日谈 作家夫妇和上海街头的猫,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吴南瑶